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多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一股脑儿地压到他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当时是他们在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成了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成了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一个接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的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

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



1973年毛泽东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

1973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的愿望为何落空?

秦九凤

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传》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还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 邓小平无法多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也没有谁能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一人之身。而晚年的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中央及身边的人都产生了怀疑。他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在一次会见外宾后,他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于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路。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个永远的教训……

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

■ 王洪文不愿多学习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贵,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被毛泽东看中,决定作为接班人培养。可是,王洪文不仅资历太浅,而且无论德、才,他都不具备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水平。

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般事务都是汪东兴给他操办。遇有重大问题,他又不大愿意向别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态度也不够诚恳,问题就很难得心应手地处理,以致当时传出许多政治笑话来。

其中有一个笑话说,有一次王洪文为处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通话之后,问朱老总有什么意见。朱德默默无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问邓小平。邓小平笑着说:“老总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实上,王洪文也确实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作后,很快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文革”新贵们打得火热。毛泽东发觉后多次对他批评教育,他却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党夺权分子结成牢牢的“四人帮”。

王洪文不听劝告使毛泽东渐渐对他失望

甚至反感了。在四届人大上,毛泽东没有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在中央工作上,毛泽东一度让邓小平主持;批邓后不久,特别是周恩来去世后,又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王洪文,这个当年“乘直升飞机上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不听毛泽东教诲,不愿好好学习和工作,最终成了“四人帮”的重要成员而为全党全国人民所不耻。

■ 江青哪肯少说话

由于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仅使她的职务扶摇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欲膨胀,出尽洋相,抢尽风头。像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怎么可能少说话呢?

到1973年,开国元勋们已经倒的倒,死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响他们夺权上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邓小平。

当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一些做法不满时,江青马上跳出来,说这是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是“宋江”要架空“晁盖”,同时,江青还分别在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叫嚣“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还滥发淫威,当众点名批判郭沫若,当众让人摘下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将军的领章和帽徽。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江青是不满意的,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事处理得已经不再是得心应手了。他曾对身边人说:“叫总理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毛泽东的话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让她变成一个摆设而不发挥任何作用。显然,他并没有下决心将江青赶出政治局。

“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在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一幅《奔马图》上的题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路。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个永远的教训。(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